



略谈牛头党全国工作会议的重点

■ 本报评论员:余凡

众所周知,2024年是群雄逐鹿的大选年。候选精英、政治阵营、利益集团竞相出场,各种宣传、吹捧、造谣的视频;各民意机构及专家的调研、预测……纷至沓来!

BBC New 新闻5月26日援引 Kompas 研究室的调查结果,大印尼党(Gerindra)党魁帕拉波沃(Prabowo Subianto)在Z代(17至26岁)年轻人中获最高支持率。专家认为这是因为帕拉波沃的知名度,注重在社交媒体对年轻人的宣传,以及Z代青年对1998年暴力事件的隔阂和漠视;何况,年轻人更为关心切身利益及目前的经济问题。

根据调研,Z代年轻人对帕拉波沃的支持率比较普遍,高达32.7%。对甘贾尔(Ganjar Pranowo)的支持率有24.5%,而支持阿尼斯(Anies Baswedan)的仅有10%。同样情况,帕拉波沃在Y代(27至41岁)成

年人中获得23.9%的最高支持率;不过,这个年龄段的选民竟有超25%表示“不知道”“还未确定”。这种情况让评论员感到纳闷。

日后的民意当然会随政局的波动而变化,尤其是其他年龄段包括“新投票族”对候选人的抉择;但目前形势对帕拉波沃十分有利,因为Z代和Y代共占了选民的60%。帕拉波沃已表态参加2024年总统竞选;之前,他曾三度成为副总统及总统候选人。

一位年轻支持者表示,帕拉波沃有“铁腕”风格,这有利于“让印尼再次伟大”。他坦言听说过帕拉波沃在1998年的“人权纪录”,对“失踪者”的责任,但人们必须继续前行,别纠缠于他的“黑色历史”,以及“珍达那”的渊源。另有一名年轻人称:“朋友们都说,帕拉波沃的品牌重塑不错。他于2009年竞选时突出骑马的雄伟形象。但现在看来更关注新生代,虽然他的年纪

已不小,但仍然能吸引年轻人。”

政治观察员巴沃诺(Bawono Kumoro)说,帕拉波沃近来在社交媒体的宣传照提供娃娃脸,经常抱着猫儿出镜,与之前的“强人”形象大相径庭。说话语气也不像以往那么强硬,就是这种“品牌重塑”(rebranding)的效应,为他在年轻人中获得不少支持。

伽查玛达大学(UGM)政治研究员叔玛玛迪(Mada Sukmajati)认为,帕拉波沃轻松的宣传策略目前还能生效,因为竞选活动还未到辩驳国家前景的层面。“以社交媒体平台吸引支持这的策略并没有错,但关键是治国方案,而不是猫儿、迷人、晨操等小事。”不少评论也对帕拉波沃的高支持率感到担忧,因为他们始终难忘1989年的惨案。

根据资料评估,当2024年举行总统大选时,Z代年轻选民约有4700万人,Y代成年选民约6900

万人,而X代(42岁以上)中老年约5770万人。比较年轻的选民通常更倾向于理性和现实,他们不太关注候选人的建国理念(ideology),所以对选择的含义很容易随着局势的指向而改换方向,不像意识形态的选民那样具有更高的忠诚度。

印尼CNBC网6月5日援引“印尼政治观察”(IPI)在5月26至30日期间对任选的1230人以电话提问对3名总统候选人的态度;可以看出,自今年起,阿尼斯的支持率不断呈现下滑趋势。而帕拉波沃的民望却慢慢超越甘贾尔。据IPI最新的民意调查,帕拉波沃以38%领先,甘贾尔得34.2%屈居第二,阿尼斯以18.9%忝居末座。

另一家民调机构SMRC于5月底举办的电话问卷中得到稍有不同的结果。在具批判能力的中产阶级群体中,甘贾尔的支持率高达37.9%,帕拉波沃获33.5%,而阿尼斯仅有19.2%。此外有9.4%民众

表示还没有决定拥戴的总候选体候选人。与IPI的观察结果相同,SMRC认为半年来阿尼斯的支持率持续下滑,而甘贾尔与帕拉波沃的竞争更为明朗。

著名政论员阿德(Ade Armando)曾在CokroTV发表视频讲话,提醒斗争民主党必须改变对该党候选人甘贾尔的宣传策略,加强宣传队伍。因为社会上已开始出现不利于总统及甘贾尔的各种传言;而阿尼斯阵营眼看形势不妙,也纷纷发起歇斯底里的反攻。

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印尼防长帕拉波沃在没有与外交部长交流协商的情况下,贸然发表有失公允的国策,还被乌克兰防长打脸怼回,成为国际话柄。可见帕拉波沃的智囊急于让他在国际舞台露脸。

《罗盘网》(KOMPAS.com)于6月6日报道,佐科维总统当天9时45分乘专

车到雅加达南区的斗争民主党(PDI-P)党校总部,参加该党举行的全国工作大会(Rakernas)。总统穿着红色与黑色相间的泽上衣,被一众斗争民主党的骨干领导迎接进入大厅。

斗争民主党的2024年总统候选人甘贾尔也在迎接的队伍中,但见佐科维微笑着久握他的手,甘贾尔则恭谦地低着头。“牛头党”的这场全国工作大会将连开三天,而且是罕见的“闭门会议”,据称,佐科维将在会上讲述扶贫政策,并希望2024年接任的总统能继续进行富国利民的高远计划;不逞匹夫之勇,具备忠诚坚毅的超强胆魄!

全国工作大会特意选在“国父”朋加诺的诞辰开幕,意味着“牛头党”牢记背负先辈的重托,勇对充满挑战的未来;工作大会将巩固甘贾尔的愿景和使命。相信佐科维慧眼识别敢于承担的接班人;希望PDI-P团结奋斗,全力支持忠诚奉献的候选人。



不止于霸权,“美国主义”已在印太复活

等都必须如美国所愿。比霸权主义更进一步,“美国主义”不仅强调地区和国际秩序必须符合美国的偏好,同时更是坚信地区和国际秩序有且只有唯一一种选择才能是最佳的。

美国防长奥斯汀在今年6月“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的讲话把“美国主义”的核心思想体现得淋漓尽致,而美国在会议期间与日本、澳大利亚和菲律宾的首次四国防长会晤,以及美国和加拿大两国军舰强行穿越台湾海峡等更是衬托拜登政府基于“美国主义”的具体实践。

奥斯汀的演说可以概括为三个关键词:原则、规则和权力,其实质是解决一个问题:即印太的美国还是美国的印太?这一问题的答案是显而易见的,美国把自己视为太平洋国家的中心,把印度洋-太平洋视为美国的“内湖”。在美国看来,美国是印太地区秩序的中心,美国倡导的原则、规则和方案具有唯一性。

其一,奥斯汀口中的“原则”最终解释权必须在美国。美国一方面把中国在台海的军事演习等正常活动定义为

“单方面破坏现状”,另一方面不断向台湾出售各式武器装备并提供战斗人员训练,且自去年以来以众议长佩洛西为代表的府会和前政要代表团密集窜访台湾,为台湾民进党当局的“台独”进程提供实质性支持。同样,美国以外交、军事、舆论等各种形式支持菲律宾等南海周边国家推进争议海域的单边油气和执法活动,破坏中菲等争端国之间的君子协定,导致了海上形势的反复。在美国的逻辑里,在台海和南海到底是“谁胁迫”“谁单方面破坏现状”等应该按照美国的标准、由美国来裁定,而与事实本身无关。

其二,美国所谓的“南海规则”是“美国的规则”。奥斯汀称中国在南海上空对美国及其盟友飞机进行数量惊人的危险拦截,美国不会接受海上或国际领空的危险操作吓倒,将支持其盟友和合作伙伴保护自己免受胁迫和欺凌。但事实是美国在南海对中国的空中抵近侦察不仅次数逐年增加且保持高平状态,还在侦察距离和手段上不断刷新记录。2022年美军在南海对中国的抵近侦察次数超过了3000架次。同时,美军逐步缩

小对中国空中侦察的岸线距离,甚至逼近中国的领空也已成为常态。中国所谓的“危险操作”“危险拦截”是基于美国定义的规则的歪曲解读,并非各方为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和管控中美两军竞争所达成和应该遵守的规则。

其三,美国的印太地区秩序本质是美国的压倒性权力优势。奥斯汀提出了美国在印太地区的一系列部署计划,包括到2025年将在日本前部署第12海军陆战队滨海团;增加美军在澳大利亚的轮换存在,包括战斗机和轰炸机特混部队的轮换;投资扩充潜艇、航母和驱逐舰舰队——以及太空、网络空间和远程火力;以及联合日本、印度等共同研发无人作战空中系统、反高超音速、防空和导弹防御技术。凡此种种计划都指向了一个目标,即美国正在重新打造第一岛链及推进第一岛链和第二岛链的一体化,以绝对的军事力量优势将中国逐渐外扩的影响力“推回”到第一岛链以内。美国所谓的“稳定和安全的地区”实质上是美国必须是居于区域权力结构的中心地位,且这种权力分配必须是美国充分认可的。

其四,美国认为美国才是地区国家实现利益诉求唯一正确的选择。奥斯汀在演讲中历数了美国和日本、澳大利亚和南太岛国的合作,并在回答提问时称,地区各国都有自己的利益,美国必须借助双边、三边和小多边的方式来帮助盟友和伙伴保护他们的自身利益。奥斯汀实则透露了美国印太战略的隐藏逻辑,地区国家只有选择和美国开展双边和小多边的合作才能确保各自利益诉求。

2017年以来,美国战略界开始反思冷战时期对苏联战略的独到之处,并认为通过组建强大“阵营”,在盟友和伙伴的数量上超越竞争对手,并控制全球优势资源地带,是美国赢得冷战的关键。如今,种种迹象表明拜登政府试图重拾这一战略。美国一方面极力避免与中国发生正面的军事交锋,另一方面加快组建以中国为竞争对手形形色色的“阵营”,从“美日+”“美菲+”到“奥库斯”和“四方安全对话”到“供应链联盟”“芯片联盟”和印太经济框架以保持技术和产业优势,希冀能令中国“不战而降”,接受基于美国主义的印太地区秩序安排。

奥斯汀虽声称“美国不寻求新冷战”,但这只是迷惑人的外交辞令,自特朗普政府以来的美国以势力范围划分国家间关系的做法,以及拜登政府为澳大利亚列装核动力潜艇编队、支持日本在西南诸岛部署战斧导弹、在关岛部署中短程导弹和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以及在菲律宾建设9个军事基地,这些都深刻表明美国在行动上已经拉开了新冷战的序幕,美国当前几乎所有的外交和军事行动都在朝着冷战的方向迈进。

昭昭天命,这是美国史学界对于19世纪美国扩张运动的概括,同样也是对今天美国所谓“印太秩序只有按照美国设想才是合理的”的最好诠释。但美国的“天赋使命”却与今天以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作为重要特征的国际秩序格格不入。美国以“世界警察”的姿态在印太地区颐指气使,正在让这一地区变的越来越“不安全”,印太地区的绝大多数国家对“美国主义”带来的“新冷战”“大国竞争”同样也充满了厌恶和排斥。(本文作者:陈相杪,中国南海研究院世界海军研究中心主任)

独立准备调查会和独立准备会中的华人代表 (2)

■ 廖建裕

林群贤

林群贤(Liem Koen Hian)是土生华人在政治界和新闻界的风云人物(其在土生华人新闻界的功绩详见第二部分的《林群贤:记者兼政治家》(Liem Koen Hian: Wartawan Cum Politikus)。他成立的印尼中华党(Partai Tionghoa Indonesia,简称PTI)首次确立了支持印度尼西亚的政治导向,许多土生阿拉伯人的政治观念也受到他的印尼民族主义观点的影响。

林群贤1896年生于马辰(Banjarmasin),在荷兰学校毕业后他飘洋过海去了爪哇、苏门答腊,然后辗转回到爪哇。他曾在许多杂志和报刊担任过记者及主编。

当他刚投身新闻行业的时候,荷属东印度的华人被中国反殖民主义的民族主义思潮感染,这思潮也深深影响了血气方刚的青年林群贤。所以当时他对荷属殖民政府进行口诛笔伐也不足为奇。其时,位于巴达维亚(Batavia)的《新报》(Sin Po)团队是宣扬中国民族主义

运动的领头羊。

1928年,接受荷兰教育并且有商业和其他专业背景的土生华人成立了名为中华会(Chung Hwa Hui,简称CHH)的政治组织,为了与荷属东印度的荷兰中华会区分开来,该中华会也被称作“爪哇中华会”(Chung Hwa Hui - Jawa)。起初林群贤乘兴而来,但当他得知该中华会(CHH)也支持荷兰殖民政府时,毅然决定退出该组织。他这种意识的转变发生在他在泗水担任报纸主编之时。

林群贤与众多的土著记者以及知识分子相交甚好,与土生阿拉伯人也常常往来,因此,他主编的报纸是亲印尼的。他当时提出的理念是“公民”(Burgerschap),还未使用“印尼公民”(Indonesischer)一词。但众所周知林群贤是印尼民族主义运动的坚定支持者,该运动自印尼共产党在1926年至1927年间的起义后开始兴起。

林群贤热爱足球。1932年5月,为了抵制荷兰足球运动员比赛,他成立了“有色民族”(土著、华人和阿拉伯人)行动委员会,该委员会得到了土著报刊和《新直报》(Sin Tit Po)(林群贤主编)的支持。此次抵制活动最终在约40个

组织的支持下取得胜利。但是林群贤却被拘留,后来在支持者的抗议声中获得释放。

同年9月林群贤在泗水成立了印尼中华党(PTI),同样得到上述组织的支持。林群贤的挚友阿卜杜·拉赫曼·巴斯威坦(Abdul Rahman Baswedan)也受到他的影响,在1934年成立了印尼阿拉伯协会(Persatuan Arab Indonesia,简称PAD),三年后更名为印尼阿拉伯党(Partai Arab Indonesia)。

他创立的印尼中华党(PTI)致力于推动印尼独立,还鼓励土生华人将自己视为印尼人[1]。他还批评了中国民族主义派(以《新报》团队为代表)和亲荷属东印度派(以中华会为代表)这两个土生华人政治流派。在林群贤看来,这些流派已经不适应土生华人在印尼的发展情况。他表示,只有支持印尼民族主义才能让印尼土生华人稳定繁荣。由于当时印尼仍未独立,他承认印尼民族主义观念太过超前,但是他坚信印尼必将独立并成为被全世界承认的主权国家。

当有人就他政治立场的转变提出批评时,林群贤为自己辩护道,自己的确曾支持过中国民族主

义,但是当意识到自己将来生活的土地是印尼而不是中国时,他选择主张印尼民族主义。

也有许多土生华人对林群贤的立场表示质疑,以下引用的一些问答,可以有助于解释林群贤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思考方式。

赵丰义(Tio Hong Gie)问:“如果我们主张印尼民族主义,我们的利益会受到损害吗?”

林群贤回答:“当然不会,我们的利益依然会受到重视,因为印尼人的利益和我们的民族利益是一致的。”

中华会(CHH)人士陈泽炳(Tan Tek Peng)接着问:“如果二者有冲突呢?”

林群贤回答:“那就必须要思考一下,到底是什么导致了冲突。”

中国民族主义派曾添和(Chan Thiam Ho)问:“为什么在中华党(PTD)的党规中不提及中国?”

林群贤回答:“不提及中国,是因为我们将会一直生活在印尼这片土地,而不是中国。”

张平立(Thio Ping Liep)问:“假如我们成为印尼人,那中国和印尼交战时该怎么办?”

林群贤回答:“中国和印尼交

战只是我们前的臆测,当然这还需我们进一步讨论。如果两国真的开战,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查明战争的原因。

如果中国想要以帝国主义的态度挑起和印尼的战争,我肯定会支持印尼,因为中国此举等同于违背孙中山先生的遗愿,因此在印尼的华人也会反抗这一姿态并且站在印尼人的一方。

林群贤是印尼筹备独立时期的独立准备调查会(BPUPK)的四位土生华人代表之一。在独立准备调查会的会议上,他一直主张所有土生华人必须被授予印尼国籍。在他的发言中,他重述了玛琅、泗水和万隆的华人先驱发表的言论。

但是他的主张及建议并没被独立准备调查会采纳。对此感到失望且愤怒的林群贤在7月16日以“因为我不是印尼土著,不太适合留在该委员会”,为由向委员会秘书处递交了辞职信。

1950年林群贤与土著以及华人代表一同成立了印尼力量党(Partai Tenaga Indonesia,简称PTI-Baru),这一政党不只是华族的党派,而是多种族的党派。但该党派并不受欢迎。1951年,在针对



林群贤

左派分子的“八月大逮捕”中,林群贤被苏基曼(Soekarno)政府逮捕。他在狱中饱受折磨,在经历三个月的囚禁后终于获释,但他此时却选择放弃印尼国籍。据曾任印尼中华党(PTI)秘书的蔡志良(Tjoa Tjie Liang)表示,林群贤此举是因为曾经“并肩作战的朋友”如今亲手把他送进监狱,这让他痛彻心扉。虽然放弃了印尼国籍,但他依然定居在印尼。他从未持有中国护照,也从未踏上祖籍国的土地。1952年11月4日林群贤在棉兰逝世。

(原载《华人在印尼民族建设中的角色和贡献》(第三册)。本篇未完待续)